

③ 大 學 生 叢 書

歷 史 之 懲 罰

勞 思 光 著





勞思光 早年在北京大學及臺灣大學研讀哲學

自一九五一年起即從事撰述

港大專學校執教

基學院哲學宗教系

林斯敦大學作訪問研究

③ 書 叢 生 學 大

罰 懲 之 史 歷

著 光 思 勞

版 出 社 活 生 學 大

有 所 權 版

究 必 印 翻

版初月十年一七九一

版再月一十年二七九一

版三月九年四七九一

版四月四年二八九一

The Punishment By History

BY S. K. LAO

The College Life

罰 懲 之 史 歷

著 光 思 勞

社 活 生 學 大：者版出

號 九 道 院 書 城 龍 九 龍 九 港 香

司 公 行 發 報 書 聯 友：者行發

號 三 十 七 街 園 花 角 旺 龍 九 港 香

八 五 四 八 五 九 一 三 三 七 三 二 六 九 一 三 話 電

廠 刷 印 友：者刷印

樓 九 厦 大 森 利 號 三 廿 街 美 四 崗 蒲 新 龍 九 港 香

三 二 九 七 五 二 一 三 話 電

目錄

單行本自序	一
自序	一
第一章：總論——幻想、迷信與欺詐之文明化	二七
第二章：民族地位之幻想	四五
第三章：歷史方向之幻想	六二
第四章：人性之幻想	八三
第五章：中國知識份子之幻想	一〇八
第六章：國際謀略之幻想	一三一
第七章：幻想、迷信及其懲罰	一三〇
第八章：幻想之昏蔽與欺詐	一六六
第九章：政治制度之欺詐	一八六

第十章：社會活動之欺詐·····	二〇九
第十一章：言論之欺詐·····	二二五
第十二章：欺詐之懲罰與現代人類之苦難·····	二四一
第十三章：結論——歷史之債務與債權·····	二五七
後記：論「承當精神」與「最高自由」·····	二七三

單行本自序

「歷史之懲罰」是一九六二年寫的，當時分章在「祖國」周刊上發表，原有一篇「自序」。現在友聯出版公司要印單行本，編輯先生要我再寫一序文，我一時想不出怎樣標題法，只好稱之為「單行本自序」。

一九六二到今天，已經整整九年。九年來我自己心情變化自然不小，可是外界的變化卻更大。通常一個人讀自己十來年前的舊作，大概總會覺得與當前自己的想法有些差異，何況這九年恰恰內外變化都極大呢？友聯編輯大約也感到這一點，所以，在排印前曾經問我要不要修改，可是，我答覆說，我不打算修改，因為我願意「存真」。

我本來有許多似乎古怪的癖好，所謂「存真」也可以算作癖好之一。我自己對已寫成的東西，從來不會十分滿意，因此我之不想修改舊作，完全不表示我認為舊作夠好。不過，好或不好是一回事；我從前的確是這樣寫了，卻是事實。追改有甚麼意義呢？倘若我的看法與舊作大不相同，我也只應該另寫一本書；不必將前一階段的東西硬改成後一階段的面貌。這就是「存真」的本意。我有這種癖好，因此我最厭惡別人修改歷史；自己也不願意使過去事實遷就現在的標準。

然而，在我看過了舊作全文之後，我卻很明顯地感到自己許多觀點的變化；同時，看了九年前舊作，自己又有些類似看別人文章時的感想。下面就舉出幾點較重要的談話。

第一：當我寫這本「歷史的懲罰」的時候，我對中國問題正感到一片漆黑；因此，文中很少透

露出任何正面希望。那時候，中共的黨權控制甚為堅強，而他們的政策正以大躍進、人民公社等一套謬誤的經濟方案為中心，恰恰是我所反對的。這樣，我覺得中共的黨機構既如此堅強嚴密，則要自外而投射任何影響去改變它，是幾乎不可能的；而另一面中共自身的路線又是如此非理性而荒謬，除非它改變，決不能引向較光明的前途；加上反共的勢力自身更是毫無生氣。那麼，中國問題有甚麼出路呢？我當時的確覺得看不出希望來。於是我寫這本「歷史的懲罰」，打算結束我那些年中論政的文字。我會對幾個比較親近的友人說，我寫了這本小書之後，不打算再談中國問題；因為虛幻的話多說無用。我當時心情也確是如此。我既然不能找出中國問題的解決之道，只好退而做我自己的哲學工作；至於時代的苦難，則只有承當而已。

在這樣的心情下，我寫完這本小書。書中只強調說明種種已有的錯誤，顯出我們今日的苦難的根源，而并未提出具體的主張；因為我當時本找不到甚麼新出路，只有一個清償歷史債務的抽象主張或態度可以提出來，我在書中也不再勉強說甚麼虛幻的樂觀話頭了。

九年後的今天，我的看法與心情都大大不同。

首先，就中國問題說，我已經由看不出希望變為有確定的希望。

這個變化是在中共一九六六至六七年間發動「文化大革命」時發生的。

「文化大革命」這個事件，確實在我預料以外。它的發生不論牽涉到多少「內幕」，它的後果卻是非常明確的——即是：中共黨機構的崩解。這個崩解對中共的政治生命講，是一個無前例的大變化。毛澤東以「黨領袖」的身分，竟然運用黨外羣眾來打碎黨機構；於是中共統治在本質上走入一個

急變階段。這個變具體地說，即是地方軍權的興起與中央權力的衰弱。毛本人發動文革，目的自然不是要得到這個結果，可是，當「紅衛兵運動」只能破壞黨機構而不能擔承「接班人任務」時，「三結合」的決策成了虛文，唯一的退路便只能是提高軍人權力，讓各地方的軍事首長來收拾亂局了。這是翻天覆地的「文革」結果走上了「妥協路線」的理由。這個妥協的具體的表現是在「九大」，但它的影響深遠異常——可說是改變了中共以及中國的前途。

我在「文革」初發生時，便看清了這一點；因此，儘管在「文革」的影響下，香港發生無計劃的動亂，我卻反而由消沉一轉而進入真的積極階段。那時候（一九六七的夏天），香港炸彈滿街，人心惶惶；許多患恐共病的人只知道逃往外國，而我則通過我對「文革」的了解和判斷寫了幾篇短文，在「展望」上發表。我不但對香港局面不怎樣憂慮，而且對中國問題表示了新希望。從這一角度看，我那些短文在字數上雖然遠比我連年所寫的東西為少，但對我個人而言，卻代表我由漆黑一團中走向一線微光的階段中的觀點及感受，也是我寫這本「歷史之懲罰」後僅有的時論文字。

在那些短文中，我并未清楚地描畫我對中國問題遠景的看法，但我對「文革」的結局已作了判斷；而這些判斷也就是我對中國問題的新看法的基礎。

我的看法說來也很簡單。中共黨機構之堅強，是它的政治生命的主要支柱。當我在「文革」發生的前五年（即寫「歷史之懲罰」的時候），我看不出有任何辦法從外面來破除這個頑強的力量，因此我看不出中國的希望何在。可是，歷史的演變，竟會有完全出乎常理的時候。毛澤東以黨領袖的威望居然自己由內來破壞了黨機構。這是我全未料到的事，而且是完全不能想像的事。可是這件事居然實

際上發生了，於是中共的面目，中國的前途都由此大變了。

這一變化大致可分以下幾點說明：

(1) 由於毛澤東運用「紅衛兵」來進行鬭爭，結果破壞了整個黨機構；這種破壞表現在兩方面：其一是黨對羣眾的威信的喪失（因為這個運動使羣眾發覺黨路線竟會完全是「錯」的），其二是黨幹部對黨的信心的喪失（因為幹部發覺黨領袖本身可以反黨，而「黨路線」成爲全不可解的東西）。合起來說，中共特以建立現代化的有力統治的主要條件——黨機構，竟由毛的「文革」而受到根本破壞。

(2) 黨機構一經破壞，中國大陸立即陷入呼應不靈的局面；像一所大工廠突然電路遭受破壞。北京的領導者（包括毛自己在內）對全國局勢失去控制；於是到處只看見秩序崩解，而看不見新秩序建立。這是一九六七至六九年初的大形勢。由此可看出「紅衛兵」不能擔承「接班人」的任務，只能「奪權」或搗亂。毛及其他領導人不得不另行設法終止亂局。

(3) 「文革」的「紅衛兵」既破壞了黨機構，原先掌握黨權的人物——如劉鄧等——自然喪失了權力；但各地方的軍人仍然保持自己的力量。當中共中央的「文革派」被迫終止亂局的時候，唯一可仗以恢復秩序的力量也就只有地方軍人這一支勢力了。於是有一串與地方軍人妥協的方案形成，其中最顯著自然是所謂「九大」了。

(4) 「九大」代表妥協方案的第一個重要環節；第二個重要環節當是現在正籌備中的「人代會」。但這些環節都屬於妥協方案這一系，多幾個或少幾個均不影響妥協方案本身的特殊性質。

(5) 妥協方案施行的結果是：一方面由中共中央讓出大部權力，交給地方軍人，使地方軍人權力大大

提高；另一方面是由於大家接受了妥協方案，實在即是承認安定秩序的必要性，因此，在妥協方案下，中共對內對外的大政策，都轉向緩和。可是，這種緩和是否是長期性的，則要看妥協路線本身能否長期維持。

(6) 這就接觸到當前中共形勢的大問題了。簡單地說，即是：如果毛自己下一步的收回權力的行動成功，則這個妥協路線即成爲暫時的，而會在毛的行動成功時結束；那時候中共的黨機構即將回到文革前的堅強狀態。反之，如毛不能成功地收回權力，則權力繼續分散在地方首領手中，中央領導即愈來愈空虛，黨機構也只有虛名，妥協路線即成爲長期的；而且會引生下一步更深遠的影響，終將使中共統治變質（變成甚麼樣子，當然要看新加上的因素有些甚麼）。然則近來事實上發展如何呢？

很顯然，毛的「建黨運動」，即是毛要收回權力的主要行動；毛建黨如成功，則權力將由地方軍人手中奪回來。這是最合乎毛的願望的情況。可是，自一九六九年九大以後，毛的建黨工作一直未見進展。到了最近，清算文革幹部的事件屢屢出現，甚至曾任「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也受到明顯的打擊；雖然目前尚未完全定局，可是，我覺得相當有理由判斷說，毛這個行動不會成功；換言之，目前的妥協局面將會長期延存下去。尤其到了一九七一年的八月，各地「黨委會」宣佈成立時，事實上這正表示另一種「建黨工作」的完成，也就是毛及「文革派」在「建黨」上失敗了。

這樣，中共的大形勢成爲：中央權力虛弱而地方軍人權力高漲。軍人把持下的「黨機構」取代了真正的黨機構。雖然毛以其個人威望尚能籠罩一時，可是中共的面目實際上業已大變。進一步看，中國問題在這一場巨變後，也演進到另一個階段。

「文革」以前的中國問題，只是一個能否擊敗共產黨的問題；因為不經「文革」這種內發的大破壞，中共黨機構無法動搖，因之，中共統治也不會有甚麼改變。但「文革」一經發生，黨機構全面崩解，便使中共統治內部變質。今日的地方軍人當權之局，本身即代表另一種統治形式。這種統治形式延存下去，中共即不再成爲一個堅強的大極權勢力。這樣，「文革」前幾無可能的「內部演變」，在今後這種權力分散的形勢下，都成爲可能。這使中國問題轉入了新階段。

現在我可以回到這本小書上了。當我寫「歷史之懲罰」時，我完全不會想到毛會運用其黨領袖地位，作出這樣荒謬的破壞黨權的運動；因之，我不但不能預見「文革」之發生，而且不會如此假想過。由此，我當時也不覺得中共統治的內部演變有甚麼可能性。而另一面我們又不能看出來如何能擊敗中共，所以，我當時完全看不見甚麼希望。這是我在一九六二年寫書時的基本心情。九年後，中共有如此的奇變，中國問題也轉入了新階段。我自己的心情也隨之改變。我現在不覺得中國問題是一團漆黑，相反地，我看到確定的希望。這就是由中共黨權的衰謝，引生一種新的政治路線，以取代常常違背理性的共產主義的希望。

這個新的政治路線，在基本上仍將是社會主義的；否則不能與現有的社會結構相應，也不能與現階段的中國問題相應。但這種新社會主義將淘汰反理性的因素，涵有新的內容，避免共產主義（非理性的社會主義）的錯誤。

如何建立這種新社會主義的觀念及制度，以及如何能使它在中國實現，而爲中國問題提供新解答；是頭緒萬端的大工作。未必是少數人所能完成的，也不是短期中所能完成的。但至少我們看中國

問題的未來時，已經由此可以見到希望所在。關於「新社會主義」的問題，我近兩年曾計劃另寫一本書。倘若寫出來，它正好與這本「歷史之懲罰」相配，成爲兩本代表我對中國問題看法的演變的書，各代表一個階段。當然，那是與現在這篇序文無關的事。在這裏我也不再談下去。

以上談的是有關我的基本態度的問題。此外還有涉及這本小書的內容的地方，可以談幾句。

第二：就這本書的內容講，我首先要說的是：我自己當初寫完它的時候便覺得有許多問題未及評論，而今日我重讀舊文，更覺得遺漏的問題極多。

就理論結構看，我原是通過「幻想」與「欺詐」兩個觀念，來說明當前歷史階段中人們所已有的種種錯誤及墮落；然後在「歷史的債務與債權」一配景下，將這一切已成的過失歸爲債務，而提出長期努力，以清償債務，轉握債權的主張。大致地說來，這一條理論脈絡，在今天我自己來看，仍然是可用的（這也是我不拒絕重印這本書的主要理由，否則，它就決無重印的價值了）。但是，在這本書中，我對一個有關鍵性的論點，未加論述。現在可以補說幾句。

這個論點即是所謂「歷史任務」的論點。一提到「歷史任務」，人們難免想到一種「命定論」；其實，明確地說，它與「命定論」不是一事。我們要了解「歷史任務」的真實意義，應該從制度或文化秩序着眼。每一階段的歷史中，人類的生活是好是壞，主要即看這階段中人類已有的文化成績對人類所面臨的問題是在甚麼情況中。第一個可能是：這個階段中已有的文化成績已足以解決人類面臨的問題。這時，我們即看見穩定而有生氣的文化秩序（具體的表現即是制度），因之也就是歷史上所謂的「盛世」。第二個可能是：這個階段中人類所面臨的問題，越出已有的文化成績的範圍，於是文化

秩序便顯得無力甚至崩解混亂，這樣我們就看見歷史上所謂「衰世」。第三個可能是：這個階段中，人類面臨的問題雖已非已有的文化成績所能籠罩，但人們已清楚了解這一點，因而能針對問題去創造新的文化成績，建立新的文化秩序，來尋求解決。這就是歷史上由衰而盛的世代，亦即所謂「剝極而復」的時候。這三種可能自然還可以再作「次分」；但大致上我們列出這幾種可能的歷史階段，即可以解說所謂「歷史任務」了。

所謂「歷史任務」，即指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人們對於歷史問題應作的努力而言。理論地講，盛世、衰世以及由衰入盛的各種階段中，自然皆有應作的努力；但事實上，由於人類的問題愈來愈多，文化成績的進展卻不能很快，因此，盛世每每不能維持很久。而衰世一經到臨，人們的主要努力即應是如何認清已有文化秩序之失效，如何從事新的創建，以引導歷史由衰亂中脫出。這種「歷史任務」就是我們最應注意的事。在盛世中，人們是否了解歷史任務，問題不很嚴重，但到了新問題越出舊文化成績時，則人們能否掌握歷史任務，便是一個極嚴重的問題了。因為，衰世之長短每每即視此種覺醒之早遲而定。覺醒得太遲，則種種未覺醒狀態中的活動，每每便更加深問題的複雜性，使新的創造努力遇到更大的困難。

這樣，我在這本書中所談的「歷史債務」的問題，實在應該以這個了解（對「歷史任務」的了解）作為基礎。必須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面，所謂清償歷史債務等等方有明確意義，方能更接近時代問題的真相。而我在一九六二年下筆時，只注意內部的理論脈絡，對這個基本了解卻未深說，這是一個大的遺漏。

這個遺漏的嚴重性，如進一步看，就更明白。由於這本書中未強調文化秩序之失效與歷史任務等觀念，因此，當我描述各種幻想及欺詐時，我對這些過失罪惡與制度的關聯就說得太少。這就使讀者很有理由相信這本書中所指陳的罪惡過失都似乎是個人的事。結果，必使歷史債務的清償成爲懸空之說，因爲，我們今天要清償歷史債務，則必須從創建新的制度着眼；否則新的文化秩序無由建立，那些作爲罪惡過失之源的歷史問題無由解決，則我們便會長期留在承受惡果的狀態中，談不上償債了。所以就理論結構說，本書的結構雖然可用，但歷史任務這個基本論點之遺漏，卻是必須指出的。其次，就書中所列舉的種種幻想欺詐而論，這自然很難在嚴格意義上說有甚麼完整不完整的問題，因爲凡是這一類論述，其分類總只是方便爲之。不過，具體地說，則有幾點也可以談談。

其一是關於「廣告」之欺詐的問題。我在本書中對廣告活動所代表的現代之欺詐，曾經極力說明其邪惡性。但這種邪惡自有制度根源；書中未能深論，因之只算是敷衍病象，而未指出病根。

其二是關於「教主之幻想」及「學院之欺詐」方面。我在這些地方所指陳的現代罪惡及過失，雖然不能說不對，但遺漏甚多。尤其「教主之幻想」所以產生，又與當代中國思想問題有關，應涉及較進一步的理論的展示；這在本書中未能做到。

其三是關於國際謀略方面。我在寫這本書時，是在純粹反共觀點下着筆的。其時我未想到共產世界內部會有自毀黨機構這種變化，因之，一方面我很悲觀，覺得中共問題無法解決，中國問題沒有出路；另一方面我評論國際謀略，也只注目於「反共無效」一問題上。今日看來，則反共無效的問題涉及非共及反共世界內部制度的弱點。「不戰而勝」的觀念，又另有其背景。我在這本書中批評「不戰

而勝」的想法不可通，是不錯的，但對這種想法的來源未作探究。雖然這在我當時是有意省畧，但今日以旁觀者眼光來看，便覺得有點「過度簡化」了。

此外，有許多小地方交代不足，又有原想後文詳細發揮，而結果不及下筆之類的毛病，這原是不難改正的。不過，我既想「存真」，也就不去改它。這本書究竟有多少可取之處，原不能由這種小地方決定。

三年前，我在一個暑夜，與幾位青年閒談時，曾說我打算將一九六二年以前的時論收集起來，以這本書作爲結尾，編成一套；算是代表我早期的時論文字。今後的時論將另編成一套。這雖有幾分「戲言」的味道，可是也代表自己一個感覺。這個感覺就是我自己對中國問題從二十歲左右就開始關心，想過不少也談過不少，近幾年畢竟有了一點確定的看法了。以今日望當年，自然許多地方不能接受自己昔日的所見所持。可是，思想識度的進展，畢竟是有連續性的。我今日所見所持，若有幾分是處，也是從許多次錯誤中翻騰而得。古人嘗以爲「少作」可廢，我則覺得留下早期寫的東西，未始不可以供自己回想反省之助。這樣，我寫這篇短序，雖是批評舊作的地方多，可是，畢竟我是高興看見它出版的。至於我今後能否寫出另一本比較使自己能滿意的新作來，則要看我今後的寫作心情如何；但有了這本舊作擺在眼前，至少對我寫另一本書也會有催生作用。

最後，應該對「大學生叢書」編輯先生表示謝意；因爲出版這種書，顯然無利可圖，一般出版機構是很難冒這種賠本的風險的。

作者 一九七一年七月

自序

很顯然的，今日的世界正在大苦難之中；而中國之苦難又遠比別國所遭遇的嚴重多多。作爲一個中國人，不論他是知識較高的人或知識較低的人，不論他是貧窮或富裕，不論他是偉大或平庸，對於這個時代中的中國之苦難，大抵或深或淺都有所覺察，即使眼前生活似乎很適意的人也不例外。

中國之苦難是多重的，苦難形成的因素也十分複雜。傳統的中國文化，曾留給我們歷史上的光榮；但也由於傳統文化的限制，中國纔會受到百年來國際劣勢中的一切折磨。外來的西方文化確會有助於我們察覺自己文化的缺陷，有助於中國之新生；但也是西方文化給我們帶來殘酷的壓迫，纔使中國人數十年來有受踐踏之感。被踐踏與蹂躪的結果，中國會有不少人要奮起自救，他們作過各種不同的努力，顯現出令人敬仰贊歎的壯志及苦心；但這些努力並未能減低中國之苦難，反而使本來嚴重的問題更加嚴重、更爲複雜。更悲慘的是，另一些人自己以爲致身於「新中國」的創建工作，是承擔了歷史的任務，但結果祇看見他們自己成爲新苦難的根源，反將中國的惡運帶到最後的高峯。不待解釋，最後這一類人就是中國共產黨了。

中國苦難之成因如此複雜，究竟歸咎於誰呢？或許後世有公平而具大智慧的史學家，能將每一因